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李何春 李亚锋◎著

# 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

芳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中山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李何春 李亚锋◎著

荒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 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李何春, 李亚锋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12

(艽野东南的民族丛书/何国强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4694 - 9

I. ①碧… II. ①李… ②李… III. ①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研究—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IV. ①K280. 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6470 号

---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周建华

责任编辑: 嵇春霞

封面设计: 林绵华 曹巩华

责任校对: 廖泽恩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8.25 印张 36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总序

黄淑婷

青藏高原古称“羌野”<sup>①</sup>，“喜马拉雅”与“横断”两条山脉在东南交汇，形成北半球地表褶皱最明显而紧密的区域——纵横千里，层峦叠嶂，忽而峡谷幽深、激流汹涌，忽而悬崖突兀、雪峰傲立。雄奇的景观掩饰着严酷的自然。适宜耕种的土地集中在河谷，陡峭的高坡土层稀疏、岩石裸露、杂草丛生，经常发生泥石流。山川、植被、动物、村庄依季节交替呈现出各种姿态：旱季，尘土飞扬、风霜严寒、万物萧条；雨季，四野青翠、鸟语花香、人畜徜徉于云端。

羌野东南素有“民族摇篮”之称。在北纬25°~38°、东经90°~104°的广袤区域，由东至西，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和雅鲁藏布江，史前时代的汉羌之争，造成部分羌人融为汉族，部分羌人西迁。<sup>②</sup> 西迁的羌人一部分沿着江河古道北上甘青，另一部分南下川滇，到达今川、滇、藏交界区，更有一些部落进入了东南亚。他们南北行走的整套路线分布的区域到公元前4世纪业已形成民族走廊。《史记》记载了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见到四川特产的见闻<sup>③</sup>，那是公元前2世纪发生的事情。又过了两个世纪，最后一批迁徙者

① 《诗经·小雅·小明》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徂徂西，至于羌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大意为周天子令诸侯征伐氐羌系部落，西行到青藏高原，将士思乡，无心恋战，企图班师回朝的情景。《说文解字》解“羌”，一为“远荒”；一为草本植物，如“秦艽”——兰花形，生长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接壤地带、海拔3 000米的荒野，愈往西愈密。故“羌野”指今青藏高原东部，即今川、青、滇、藏四个省（自治区）相交界的区域。

② 如（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2~253册）有“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獶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的记载，说战国初期（公元前475年）以“昂”为首的一支羌人迫于族群竞争的压力，由今甘陕地区向西南徙迁至玉树地区。

③ 汉朝的四川特产远播大夏绝不可能走西域丝绸之路，那样将徒增路程，最有可能的是走西南丝绸之路，起点为成都，终点为印度甚至波斯（今伊朗），中间点为夜郎（今贵州）、滇（今昆明）、南诏（今大理）、缅甸。这说明中西交通很早就贯通了。

沿着民族走廊进入东南亚。东晋、十六国时期（317—420年），鲜卑族从大兴安岭西迁，抵达青海湖与当地羌人杂处，出现西羌、吐谷浑、白兰、党项、附国、吐蕃、姜人等古代部族，也有南迁的情况出现。各氏族部落在南迁路中定居、联姻、繁衍，发生贸易、战争和宗教行为，经过千百年的基因采借与文化交汇，演变出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景颇（克钦）族、克伦族、剽族、缅族、掸族等境内外民族。<sup>①</sup> 元明以降，封建国家的势力先后侵及这片土地。目前，一块归中国，一块归印度，一块归缅甸。《艽野东南的民族丛书》就揭示了中国西南川、滇、藏和川、青、藏接壤地带极具内涵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是藏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这些民族人们的体质特征与三支种群有关：①蒙古北亚人，特征是高身材、中头型、高鼻型、前额平坦、黑眼珠，男人高大英俊，女人身材颀长；②蒙古南亚人，特征是身材略矮、低头型、前额微窄、褐色眼珠、低鼻型；③“藏彝走廊”型，介于前两者之间，又自成一类，其特征是中身材、中头型、中鼻型，孩子的眼珠较黑，成人的眼珠泛褐。具体来说，怒族和独龙族人带有蒙古南亚人的体质特征，藏族、纳西族和傈僳族人带有“藏彝走廊”型的体质特征。由于藏族人的来源复杂，内部族群众多，有的体质特征偏向蒙古北亚人。例如，三岩藏族人的体质特征与塔吉克族、维吾尔族、锡伯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北方民族关系密切些，跟藏彝类型的藏族关系疏远些。<sup>②</sup> 无论体质特征如何，这5个民族的人民都有率真淳厚、健谈好客、谦让刚毅、吃苦耐劳的一面。人们因地制宜谋取生活资料，建造房屋，修建梯田，引水渡槽，高山放牧；人们也抽烟喝酒、唱歌跳舞，知足常乐。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集中进行民族识别（1953—1956年）和少数民族语言与社会历史调查（1956—1958年）。根据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描述，当时藏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等民族已出现社会分化：有的社会结构呈尖锥形，如藏族的农奴制、纳西族的土司制；有的社会结构呈钝锥形，如保留着原始公社残余的怒族和独龙族。民族文化的保持与传承是通过社会结构来实现的。独龙江两岸的村落出现了头人、大小巫师（南木萨、龙萨）、工匠、平民、家奴。前三种人基本上是富裕的族人，他们拥有土地，蓄养奴隶，并未完全脱离劳动。奴隶来自债务和买卖，成为家庭的一员，由主人安排婚姻，给予经济开支。奴隶在公共场合（如祭礼、

<sup>①</sup> 参见（五代）刘昫《旧唐书》卷197列传第14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8～2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和（宋）欧阳修《新唐书》卷222上列传第147上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2～2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关于南蛮、西南蛮和剽国的描述。

<sup>②</sup> 参见何国强、杨晓芹、王天玉等《三岩藏族的体质特征研究》，载《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408～417页。

公议、公断等)与平民有身份界限。劳动过程中主仆地位不同,主人为奴隶提供生产资料(如土地、牲畜、农具、种子),并占有全部收获物。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各居其位,各层次的差别不大,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发生的共济、共庆、换工等集体行为维持着内部平等,原始宗教和基督教起到恐吓叛逆者、安抚民众、制止反抗的作用。旧的社会结构被打碎以后,新的社会结构逐步建立,其所传承的文化与过去有着质的不同。

17世纪,西方人陆续进入喜马拉雅东部山区与横断山脉南部的多条河谷。早期的传教士、探险家带着猎奇的眼光看待这里的风土人情。19世纪伊始,民族学家、地理学家、行政人员、桥梁工程师开始进入这片地域上无人知晓、地图上一片空白的沃野。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150年间,他们记录了大量宝贵的材料。英国、美国、印度三国学者的成绩尤为突出,如果只见他们为殖民政府服务的一面而不见其科学记述的一面是不公平的。在此,我愿意借鉴沙钦·罗伊的书单<sup>①</sup>,肯定J.马肯齐、J.布特勒、G.W.贝雷斯福德、A.F.查特尔、P.C.巴利、B.C.戈海尔、M.D.普格<sup>②</sup>等人的工作;我还要提到F.M.贝利、F.K.沃德、维雷尔·埃尔温、P.N.S.古塔、马骏达、N.罗伊、B.C.古哈和S.罗伊等人的努力,特别是约瑟夫·洛克、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和埃得蒙·利奇的奉献。

洛克于1922年到达中国西南边陲,在川、青、甘、滇接壤地带考察,为美国农业部、国家地理协会和哈佛大学收集植物和飞禽标本,在丽江度过了27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洛克的研究兴趣转移到纳西族的文化上。他的《纳西英语百科词典》收入了东巴教及濒于消亡的古纳西语,他撰写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叙述了当时甘青交界处、滇西北、川西南和西藏纳西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历史、物产和文化。1992年,迈克尔·阿里斯在纽约出版了《喇嘛、土司和强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回顾了洛克在川、滇、藏的田野研究经历。<sup>③</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奇在克钦山区打游击。那个地区为中国的滇、藏和印度的阿萨姆邦三面环绕,有号称“野人山”的莽莽丛林。利奇广泛地接

<sup>①</sup> 参见(印)沙钦·罗伊《珞巴族阿迪人的文化》,李坚尚、丛晓明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302页。

<sup>②</sup> 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孟加拉东北极边地区山区部落记事》(1836年版)、《阿萨姆山区部落概述》(1847年伦敦版)、《阿萨姆东北边境记》(1881年西隆版、1906年重印)、《阿波尔的吊桥》(载《皇家工程师》1912年第16卷)、《阿萨姆山区部落的头饰》(载《皇家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1929年总字第25卷)、《阿波尔人的农业组织》(载《人类学系调查报告》1954年第3卷第2册)、《东北边境特区的娱乐活动》(1958年版)等,这里仅仅提到很少的一部分。

<sup>③</sup> 参见Michael Aris et al. *Lamas, Princes, and Brigands: Joseph Rock'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2.

触克钦人，于1954年出版《上缅甸诸政治体系》，提出社会转变的动力学模型。几乎在同一时期，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在印度调查了10年，期间以特派员的身份在阿萨姆地区工作两年。他和妻子贝蒂·勃纳多在调查阿帕塔尼人<sup>①</sup>的间隙中，专程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斯皮峡谷，那里距离西藏的瓦弄咫尺之遥。因物资供应不足，1944年4月2日夫妇俩开始撤退，准备翌年再进行调查，后因印度政府决定推迟这项计划，最终未能进入西藏察隅地区。海门道夫基于田野调查的12本书<sup>②</sup>对于青藏高原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民族学家，无论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在利用前人收集的原始资料、绘制的地图、提炼的概念、阐述的命题和他们的民族识别、文化分类的成果，并汲取他们务实与求真的精神力量。

中国学者对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民族调查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左仁极、羊泽、朱刚夫、李式金、李中定、陶云逵、黄举安（以姓氏笔画为序）等人曾赴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地区，调查成果虽然一鳞半爪，但科学精神不可低估。李霖灿、方国瑜、杨仲鸿对纳西语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我的同仁，如王辅仁、王晓义、孙宏开、刘龙初、刘芳贤、宋恩常、宋兆麟、吴从众、李坚尚、杨毓襄、张江华、姚兆麟、龚佩华、谭克让、蔡家骐、欧阳觉亚（以姓氏笔画为序）等，跋涉于川、青、滇、藏交界区的山水之间，也提出批判地学习和吸收西方人类学的任务。<sup>③</sup> 197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后迁至拉萨，组织翻译了一批文献，吴泽霖、费孝通都身体力行地做过译介工作。<sup>④</sup> 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研究起步较晚，田野研究缺乏长期性、系统性，理论方法上也有故步自封的表现，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素材，而较容易忽视社会组织、风俗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素材。

① 中国民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阿帕塔尼人与珞巴族人同源，阿帕塔尼是珞巴族的组成部分。珞巴族包含20多个部落，如尼升、巴依、玛雅、纳、崩尼等，其经济形态与独龙族完全相同。

② 它们是《赤裸的那加人：阿萨姆邦的猎头部落的战争与和平》（1939年第1版、1968年第2版、1976年第3版）、《苏班西尼地区的民族学注释》（1947年版）、《喜马拉雅山区未开化的民族》（1955年版）、《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个原始社会》（1962年版，有中译本）、《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信佛的高地居民》（1964年版）、《尼泊尔、印度和锡兰的社会等级制度和血缘关系：对印度教与佛教相接触地区的人类学研究》（1966年版）、《尼泊尔人类学述略》（1974年版）、《喜马拉雅山区的贸易者：尼泊尔高地的生活》（1975年版，前三章半有中译本）、《喜马拉雅山地部落：从牲畜交换到现金交易》（1980年版）、《阿鲁纳恰尔邦的山地人》（1982年版）、《西藏文明的复兴》（1990年版）和《在印度部落中生活：一位人类学家的自传》（1990年版中译本）。

③ 参见林耀华《序》，见黄淑婧、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参见《费孝通译文集·前言》（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强调“补课”，出版了不少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著述，这是可喜可贺的。最近十几年，获得高级职称的中青年学者也越来越多。但是，不可否认，一些民族学工作者欠缺实地调查的经历，学界对田野调查的要求放松，对边陲少数民族的研究远远不够，市面上田野研究的著述稀少。有人说，目前田野工作的条件（如交通、通讯、住宿、饮食、医疗、安全、语言沟通、调查工具和手段等）较之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知改善了多少，可如今的实地调查与书斋研究的比例较之于过去不知减少了多少。<sup>①</sup> 本人深有同感。我虽然退休多年，但也知道一点外面的情况。现在科研的资助力度每年都在增大，下达的课题也在增多，出版界欣欣向荣，民族类的期刊、书籍相当多；但是，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没有跟上来。由于辛勤收集第一手资料和认真提炼、精巧构思并以朴实平正的笔调叙述的作品不太为社会所赏识和鼓励，因此田野作品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与历史的发展很不合拍。就青藏高原东南部而言，随着旅游的开发，三江并流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社会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意识被带动起来了，国内外迫切需要了解这一区域的民族现状，抢救、整理和保存当地的原生态文化迫在眉睫。但经常到农牧区做调查的人不多。原因何在？这恐怕与投入和产出的衡量标准有关。譬如，有些环境陌生而艰苦，原创性作品生产周期长，即使出得来，社会反应也需要一定时间，不如“跟风”成效快。“不可否认，学界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评判成果室内室外一刀切的做法，都是使田野调查边缘化的原因。”<sup>②</sup> 我认为，端正调查之风、调整激励机制势在必行，否则民族学研究将难以为继，更谈不上以良好的姿态服务于社会。

西北川、青、藏交界区，以及西南边陲川、滇、藏接壤地区，民族学资源异常丰富，吸引着以何国强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不畏艰苦、锲而不舍地调研。这套由 7 部专著组成的丛书即有选择性地介绍了那里的民族文化。分册和作者名依次为《青藏高原的婚姻和土地：引入兄弟共妻制的分析》（坚赞才旦、许韶明）、《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李何春、李亚锋）、《整体稀缺与文化适应：三岩的帕措、红教和民俗》（许韶明、坚赞才旦）、《独龙江文化史纲：俅人及其邻族的社会变迁研究》（张劲夫、罗波）、《青藏高原东部的丧葬制度研究》（叶远飘）、《妇女何在？三江并流诸峡谷区的性别政治》（王天玉）、《滇藏澜沧江谷地的教派冲突》（王晓、高薇茗、魏乐平）。翻开细细品

<sup>①</sup> 参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 页。

<sup>②</sup>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序言》，周云水、许韶明、谭青松等译，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14 页。

味，看得出作者们长期研究的积累。主编何国强教授是我的学生，也是这个研究团队的组织者。他 17 年来坚持探索汉藏区域文化，主张多学科相结合，调查素材、史志和理论三点互补，中外资料融会贯通，以及汉族区域和少数民族区域的文化现象互为衬托的研究思路。自 1996 年夏天至今，他已 11 次踏上青藏高原。担任博士生导师以后，他努力寻求基金会的支持<sup>①</sup>，推动每一届研究生到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选题作论文，秉承老一辈民族学家研究西南民族的传统，深入偏远的高山峡谷。据我所知，另外 10 位中青年作者在跟随他学习期间，除极少数人之外，皆有 1 年左右的调查经历，目前分别在高校或科研部门工作。他们的成果与书斋式的研究不同，每一本书都充满鲜活的材料，讲理论、重实际，穿插纵横（时空）比较和跨文化研究（类型）比较，散发着田野的芬芳。

调查员根据已有的知识草拟提纲，到当地观察、询问和感受，苦学语言，一丝不苟地记录，孜孜不倦地追寻文化变迁的足迹，修正调查提纲和理论预设。他们入乡随俗、遵循当地礼节，与村民建立互信，由此获得可信的感知材料。但这套丛书不是田野材料的机械堆砌，而是在科学方法和理论模块引导下的分析、综合与描述，不仅揭示了该地区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风俗制度的动力和机制、传统生计的命运、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的角色变迁等——而且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切合实际的解答。

这套丛书坚持了民族学研究偏远之地的优良传统，同时强调多维视角，突出科研的前沿性、创新性及应用性，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具有弥足珍贵的作用，同时给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民族学提供了参考价值；在抢救和整理濒临绝境的原生态文化方面，体现了学术研究在增进国民福祉及促进社会和谐过程中的作用，在为西部开发提供决策依据并带动民族文化的保护性研究等方面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这套丛书还凸显了“好料做好菜”的诀窍。前期 4 个课题资助，10 余年田野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绝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公认的产品，需要紧扣“民族特色”提炼选题，科学搭配，形成整体效应。编者先是将婚姻与丧葬制度、血缘组织、传统生计、本地宗教和外来宗教（东巴教、藏传佛教和天主教）的碰撞、妇女地位、先进民族的帮助与后进民族的发展等选题集合在一个总题目下共同反映特定区域的文化，“好菜”就做了一半；继而在中山大学

<sup>①</sup> 本研究相关课题获得 4 次资助，即“青藏高原的兄弟共妻制研究：以卫藏和康的五个社区为例”（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基金，2004—2005 年）、“青藏高原东部三江并流地区民族文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6—2008 年）、“三江并流峡谷的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7—2009 年）、“川青滇藏交界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动力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2—2014 年）。

出版社的鼎力协助下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争取新的资源来整合后续工作。这样，整道“菜”就做好了。以上两点在何国强教授与中山大学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中可见端倪，同时专家的支持<sup>①</sup>也相当重要。在这个基础上，各分册的作者和责任编辑保持良好的互动，认真审稿，精益求精地修改文本、补充资料、优化结构，本着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职业。凡此皆说明学术界与出版界的精诚合作对于完成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作用。

---

<sup>①</sup> 这套丛书于2011年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两次申报工作，均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新建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胡鸿保教授的极力推荐。

# 前　　言

碧罗雪山（又称怒山）是喜马拉雅山的余脉，处中国之西南，位于西藏之东南、云南之西北。其东麓和西麓分别是著名的澜沧江峡谷和怒江大峡谷。两峡谷之间的高山上居住着藏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这些民族至今仍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色。在这一少数民族聚居区内，每个民族都通过自身的方式展现着本民族的文化。有时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家六口人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却有着五种以上的信仰；有着共同信仰的人们却又属不同的民族，各自保留着不同的文化习俗。长期的民族互动与冲突过程，使得该区域成为民族文化沉淀最深厚、最丰富的文化带。

不同民族在碧罗雪山两麓展现了一段人类生存和适应过程中充满斗争却又五彩缤纷的历史。“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便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sup>①</sup>今天，碧罗雪山两麓多民族分布的格局和多元文化融合的现象，是各民族人民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作用下从事生产资料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是人与自然和社会长期互动的结果；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同的民族学会了如何应对来自自然和社会的压力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并在不断冲突和融合中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以此来提高生存技能。因此，无论是通过历史记忆传承下来的经验，还是吸收他族的适应技能，都成为本民族生计方式的组成要素。

总体来说，民族共同体或族群的生计模式是人类在一定的地域内依附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为维持其自身、家庭以及民族的生存、延续和发展所形成的多元的谋生手段。这种生计模式具有稳定性、开放性、多元性、合理性、系统性、延续性和关联性等特点，是受其特定文化影响的生存方式的总和。

从古至今，碧罗雪山两麓地域内的各民族共同呈现了包含采集狩猎、刀耕火种、游牧、畜牧、农业、种植业（如葡萄与核桃等）、盐业和商业在内的多种生计方式，为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为我们认识同一区域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内不同民族的多样化生计提供了一面镜子。该地域也成为众多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不顾道路艰险和个人安危，力图揭开当地民族文化之外衣的“圣地”。

笔者关注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其理由如下：

(1) 该区域地处两江峡谷之间，气候复杂，群山起伏、海拔高，原始森林植被覆盖面积广、动植物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自身恢复能力强。历史上，在中国西南的这一区域内，各民族互动频繁，冲突时有发生，使得多民族在政治博弈和族群冲突下形成了新的具有文化多样性的族群。一方面，各民族保持了族群特有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多民族聚居区内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较深，造成文化涵化。整体上，不同民族长期以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生态环境有了较强的适应性。

(2) 该区域内多元生计并存的现象特别突出。直到20世纪初，生活在碧罗雪山西麓怒江两岸的怒族、独龙族、傈僳族等民族，还过着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生活，多以采集、渔猎、刀耕火种为生计，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经常食不能饱、衣不能暖；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进行采集渔猎活动。所幸的是，碧罗雪山西麓的怒江两岸，东面是碧罗雪山，西临高黎贡山，植被丰富，动植物种类繁多，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天然的物质资料。比起西麓，生活在东麓的人民历史上受汉族、白族、纳西族等民族的文化影响深，已逐渐走向以畜牧业、农业、盐业、葡萄种植业、商业等为主要生计方式的生活。因此，东西两麓的澜沧江峡谷和怒江峡谷地带，形成了多民族共居、多元生计方式并存、多种宗教共存的文化区域，这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来说无疑是宝贵的财富。

(3) 综观全球化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急剧变化，现代化的触角已经伸入少数民族传统地区，同时某些文化现象正不断消逝，因此记录少数民族多元文化迫在眉睫。需要指出的是，碧罗雪山下的村庄毕竟远离大中城市，由于交通不便、地势险要，现代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暂时还未能完全渗透到该地区，此时进入该地区进行民族文化的研究为时不晚。

从历史观的角度来看，就一个民族而言，如果它的文化延续越久，越能证明它适应来自环境和社会双重压力的能力越强。20世纪末，中国在通信、交通等方面技术不断发展，物质资料生产不断丰富，城乡间的物质资料、基础设施、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各民族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笔者旨在尽可能认识世代生存在这片历史周期长、文化积淀深的土地上的诸如傈僳族、怒族、藏族、纳西族、独龙族等民族，理解和诠释他们的生活。无疑，历史资料的记录和现实调查的情况都表明，生活在该区域内的民族具有极强的适应自然和社会的能力，这对研究者来说是极大的鼓舞。

总体来说，碧罗雪山两麓地区具有以下人文特点：

- (1) 地域狭窄，民族众多；垂直气候明显，生计方式复杂多样。
- (2) 民族迁徙频繁，东麓各民族之间商贸往来历史悠久，文献记载表明至少唐代就已经开始有藏族和纳西族之间的交换。

(3) 该区域是藏族和汉族的中间过渡地带，包含藏、纳西、傈僳、白、怒、独龙等多个少数民族；宗教冲突现象明显，表现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之间和不同宗教（如藏传佛教与东巴教、天主教）之间时有冲突。

(4) 政权交替频繁且混乱，且表现在政治边界上的混乱，导致冲突不断发生；政教合一制度长期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

因此，本书试图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碧罗雪山两麓形成多样生计的原因，从共时性的角度剖析东西两麓不同生计的细微差异。

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本书最终形成以下观点：

(1) 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多元生计是不同民族在历史长河中，为了规避自身的不足，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围绕人类社会的两大生产（即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而逐渐形成的适应自然和社会的技术与策略；这种适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适应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是适应所在的社会组织。适应自然环境为的是通过和自然环境互动，进行自身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适应社会组织为的是给生存提供各种保障。

(2) 一个民族的封闭性是相对的，在相对的空间内，不同民族长期以来不断冲突与融合。冲突是为了在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上形成边界，融合是为了吸收不同文化间的精髓从而形成互动和共生。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使种族得到繁衍、民族自身的文化得到传承。不同民族在生存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手段，同时，不同民族在资源的占有方式上也不尽相同，以致民族之间对物质资料的不同需求要求各民族之间尽量保持一定的交换和互利关系，以保证满足身体对不同营养物质的需要。

(3) 一个民族的生存条件越艰苦，说明该民族适应环境和社会的能力越强，也越能集中表现该民族的生计方式。即生计方式越单一的民族，生存技能越强。这可以从东西两麓生计情况比较中看出。

基本结论有两条：①生活在碧罗雪山两麓不同民族的人都尽可能地适应环境，在与自然界长期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各种生存技能。②各民族人民生计方式的形成过程不仅是通过技术手段获得资源的过程，也是各民族不断和周边民族互动的过程；同时，生计也包括人们在各自的社会组织结构中，依靠非正常手段（如抢劫、乞食、占有妇女等）获得利益的各类手段。

本书是历史文献研究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产物，围绕多元生计的主题，在碧罗雪山两麓选择了三个主要田野点，并对多个自然村寨进行了调查，通过点

的描述形成面的认识。

本书以绪论展开，提出研究的问题、对象以及方法，并对有关生计的研究情况做了扼要的回顾，在此基础上阐明碧罗雪山两麓人们生计模式研究可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第一章介绍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环境，介绍碧罗雪山的地理位置、气候、海拔、雨量、各种动植物资源、卤水资源，目的是为了研究当地人生计提供背景知识；二是民族和历史，介绍该区域内不同民族的族源和历史，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二章和第三章总体介绍本书研究的各种生计形成的主要因素及其大体情况，从而为第四章到第九章的内容做铺垫。第四章介绍碧罗雪山两麓峡谷内的农业，从土地类型和耕作条件入手，展现地方社会从事的各种农业情况，分析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们形成的技能以及农事知识。第五章分析在耕种土地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如何利用人畜关系和人地关系进行转场放牧，同时介绍不同种类的牲畜和喂养方式。第六章介绍人们利用生态资源进行采集渔猎的方式和技能。第七章介绍西藏盐井传统盐业技术以及盐业生产在碧罗雪山两麓区域内起到的作用和意义。第八章着重介绍人们在获得物质资料后如何进行加工，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以何种方式对生产工具进行改进或创造。第九章介绍了藏区政教制度，分析在特定权力关系下，社会组织或个体（如寺院、土司、商人、马帮、土匪等）如何通过正常或非正常手段获得物质资料。

# 目 录

## 绪 论/1

- |     |                 |    |
|-----|-----------------|----|
| 第一节 | 本书的研究对象及其方法     | 1  |
| 第二节 | 碧罗雪山两麓生计研究的简要回顾 | 9  |
| 第三节 | 研究碧罗雪山两麓生计模式的意义 | 15 |
| 第四节 | 一次翻越碧罗雪山的经历     | 18 |

## 第一章 碧罗雪山两麓地理环境及历史/20

- |     |        |    |
|-----|--------|----|
| 第一节 | 自然气候   | 21 |
| 第二节 | 生物资源   | 24 |
| 第三节 | 族源及其历史 | 27 |

## 第二章 多元生计的形成及其中介（上）/44

- |     |              |    |
|-----|--------------|----|
| 第一节 | 采集狩猎：一种生计遗存  | 45 |
| 第二节 | 游牧：民族迁徙与文化传播 | 50 |
| 第三节 | 畜牧业：转场放牧     | 56 |
| 第四节 | 农业生计与土地所有制   | 60 |

## 第三章 多元生计的形成及其中介（下）/67

- |     |                 |    |
|-----|-----------------|----|
| 第一节 | 传统制盐业：生理需求与族群互动 | 67 |
| 第二节 | 民族商贸：共生与互动      | 73 |
| 第三节 | 天主教的传播：葡萄种植     | 77 |
| 第四节 | “政治场域”下的别样生计    | 81 |

## 第四章 峡谷农业/84

- |     |                 |     |
|-----|-----------------|-----|
| 第一节 | 土地类型和耕作条件       | 84  |
| 第二节 | 作物种类和农事活动的地方性知识 | 90  |
| 第三节 | 耕作技术与生产方式       | 104 |

<b>第五章 转场放牧/118</b>	
第一节 牧场资源的分布以及放牧方式.....	118
第二节 牲畜的种类与用途.....	128
第三节 草场管理以及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141
<b>第六章 采集渔猎/146</b>	
第一节 采集.....	147
第二节 狩猎.....	157
第三节 捕鱼.....	167
<b>第七章 澜沧江畔的传统盐业/171</b>	
第一节 生命之盐.....	171
第二节 传统的制盐技术.....	174
第三节 盐业贸易.....	187
第四节 盐民的生活.....	195
<b>第八章 产品加工与手工技术/198</b>	
第一节 食物的加工与制作.....	199
第二节 编织和纺织.....	214
第三节 建筑.....	221
第四节 木器、竹器和陶器.....	224
<b>第九章 政教合一及其制度下的生计/227</b>	
第一节 康区政教合一制度.....	227
第二节 寺院对政治经济活动的影响.....	234
第三节 川、滇、藏间的商贸往来.....	241
第四节 别样生计.....	255
<b>参考文献/261</b>	
<b>后记/273</b>	

## 附图表目录

图 4-1 砍刀与点种棍	105
图 4-2 怒锄的形态演变	108
图 4-3 德钦地区的犁	110
图 4-4 贡山地区的犁	110
图 5-1 高山牧场上的石屋与围栏	122
图 6-1 弩弓、箭袋和箭	162
图 6-2 夹网	168
图 6-3 网兜	169
图 8-1 多杆连枷与单杆连枷	201
图 8-2 割穗架	202
图 8-3 磨房与水磨	204
图 8-4 手磨	204
图 8-5 酥油桶和“甲洛”	209
图 8-6 铁锅蒸酒	213
图 8-7 破竹、簸箕与背篓	216
图 8-8 织“怒毯”	221
图 8-9 怒江地区的房屋	223
图 8-10 仓库（木楞结构）	223
图 8-11 溜索和滑板	225
图 8-12 猪槽船	226
表 1-1 2012 年 7 月碧罗雪山两麓各调查点温度测量记录	24
表 1-2 2011 年盐井乡辖区内从事盐业生产的 3 个行政村的人口结构情况	35
表 7-1 白、红盐成分分析	177